

編者按

對清末到五四中國的社會和思想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研究中，民族主義是一個重要維度，但它也猶如研究者形容的那樣，是很容易迷失的「術語密林」。方維規一文探討西文中的「Nation」在「轉型階段」的漢語表達形式。他認為，源於拉丁語的「Nation」在其概念發展史中，本身就是一詞多義的，漢語中很難找到一個詞彙來翻譯；因此，十九世紀漢語在上下文中分別用「國」、「族」、「民」、「民族」等語詞來一詞多「譯」，指涉其不同意義。他批評指出，某些西方學者把民族主義作為一種詮釋策略和濫用，居然可以得出「前現代中國根本不存在Chinese nation」的荒謬見解。

那麼在五四前後的知識份子，又是如何思考和選擇哪一個先進國為榜樣，以求中國發展方向呢？高力克考察李大釗從溫和的立憲自由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轉變，指出這與他是深受俄國民粹主義影響而提倡的「平民主義」立場密不可分。事實上，這也是當時的普遍思潮。黎建軍則用統計方法，分析以戴季陶等人為作者群的《星期評論》中提到幾十個國家和世界重大事件的出現頻度以及褒貶評價。他發現，在1919-20短短一年中，知識份子從「遠撫歐墨」到「與俄提攜」，發生了由師美到師俄的巨變。兩篇文章都指出，應該從內外兩方面來理解這一轉變的發生：一方面是辛亥革命後民主實踐和憲政危機，造成對立憲自由主義「幻滅」；但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，是中國知識份子對本國和世界重大事件，如俄國十月革命和巴黎和會的獨特感受和理解。中國的現代轉型，正是其自身演進與外來衝擊相互作用的過程，並有着自身的特殊形態。